



阶级阶层研究专题



中产阶级的 社会支持网

北京和香港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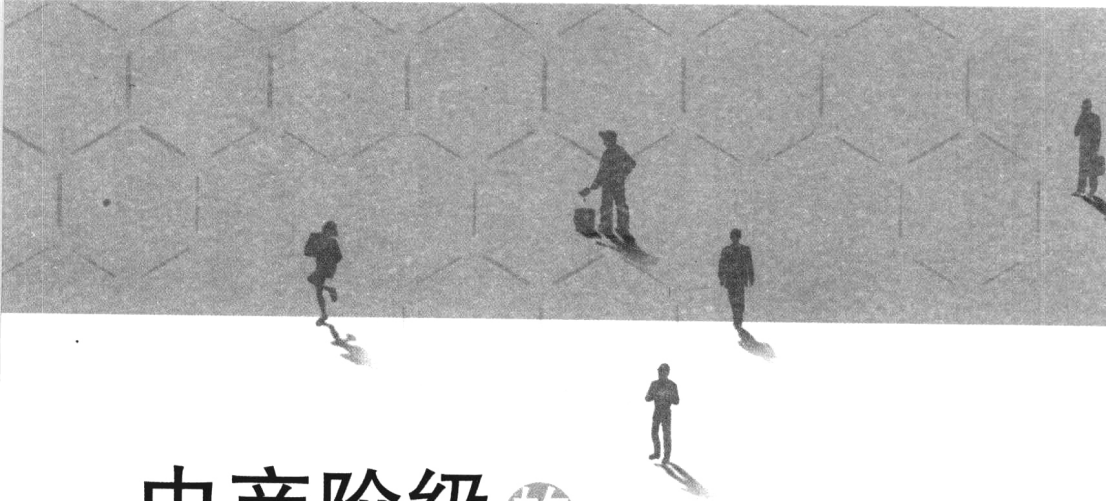
刁鹏飞 著

Middle Classes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and Hong Ko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产阶级_的 社会支持网

北京和香港 的比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持网：北京和香港的比较 / 刁鹏飞
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1

(阶级阶层研究专题)

ISBN 978 - 7 - 5097 - 1871 - 1

I. ①中… II. ①刁… III. ①中等资产阶级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093 号

· 阶级阶层研究专题 ·

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持网

——北京和香港的比较

著 者 / 刁鹏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郑 嫵

责任校对 / 李 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4 字数 / 19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871 - 1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问题的提出	1
一 目的和问题	1
二 研究的理论渊源	2
三 全书结构	7
第二章 网络分析、社会支持与中产阶级研究	9
一 社会网络分析及影响社会网络的诸要素	9
二 用网络视角分析社会支持	23
三 中产阶级的社会交往与支持获得	45
第三章 分析架构和方法	55
一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架构	55
二 预期的研究问题	56
三 资料的来源、调查的过程和采用的方法	58
四 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变量	62
五 中产阶级的操作化定义	70
六 主要的分析模型和方法	79

第四章 中产阶级的支持角色关系特征	83
一 引言	83
二 支持网角色关系类型组成	84
三 各角色关系的支持广泛性	91
四 支持圈层与“差序格局”	93
五 角色的实用/情感取向	101
六 角色的实用/情感取向与“功利性差序格局”	104
七 研究发现和讨论	106
第五章 比较两地的支持网的结构组成特征	110
一 导言	110
二 比较两地支持网的结构特征 —— 支持网的功能数	111
三 比较两地支持网的结构特征 —— 支持网 关系多样性	127
四 比较两地支持网的亲属组成 —— 支持网中的 亲属人数	137
五 小结与讨论	142
第六章 比较两地中产阶级支持感受	149
一 引言	149
二 比较香港与北京中产阶级的支持感受	150
三 讨论：解释两地支持感受的差异	183
第七章 结论	190
参考文献	203
后 记	220

第一章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 目的和问题

本书旨在描述和比较香港和北京两地中产阶级的支持网络和支持感受的异同；在现有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两地中产阶级的支持网络和支持感受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机制，特别是中观网络（关系）层面的因素对支持感受的影响；探究社会整合、支持网络、支持感受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比较两地各因素对支持感受的作用机制，说明两地宏观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别在社会支持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本书首先报告两个社会中产阶级的支持网络组成和结构特征上的异同；然后根据现有的跨地区的社会支持比较研究的成果，分析微观社会位置要素、社会整合要素对支持网络的影响，解释两地中产阶级支持网络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控制微观社会位置因素、社会整合要素和支持网络要素，比较两地中产阶级的支持感受异同。

二 研究的理论渊源

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社会主导文化价值观的承载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方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阶级理论中，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对于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理解现实的政治发展有其特定的意味（有关的回顾和讨论见 Crompton 1993）。在现代化理论中，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Kerr, Dunlop, Harbison and Myers 1973）；在民主发展的研究中，中产阶级也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介，即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教育普及，中产阶级逐渐壮大，最终成为民主化的直接动力（Lipset 1959；Huntington 1991：66；见吕大乐和王志铮 2003 第一章注 1）。以往对中产阶级的考察，着重根据其职业分析他们的市场和工作处境，分辨他们的阶级位置（classification），从而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中产阶级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社会交往生活如果不是被忽略，也往往偏离阶级理论家的中心视野。

实际上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中，中产阶级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意义。Parsons（1943）在分析现代美国的家庭和亲属体系时，曾指出美国城市中产阶级，代表了现代西方社会典型的亲属结构：他们强调夫妻主导的核心家庭（conjugal family）的独立性，要求自主择偶，强调情感的重要。在城市中产家庭中，职业结构与亲属结构是相互分离的。这种中产阶级夫妻主导的小型核心家庭，在结构上独立于扩展的亲属体系。

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夫妻主导的、独立的小型核心家庭，适应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要。新兴中产阶级也正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他们大多经历了代际的社会流动，往往同时也伴随着地域流动。中产阶级远离出生地的亲属关系和社区关系，去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在职业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这种基于功能主义孤立核心家庭的讨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质疑。现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夫妻主导的小型核心家庭，在获得独立的同时，是否孤立于他们各自的亲属关系？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夫妻主导的核心家庭缺少足够的人力资源，难以维系自给自足的功能；相应的，都市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次属关系，例如各类社会机构、志愿组织可以填补原来扩展亲属体系的功能，满足小型核心家庭的需要。但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扩展的亲属关系仍然是美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社会系统，构成核心家庭之间互助的网络（Sussman 1959, 1965）。工业化与家庭规模和扩展家庭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Goode 1963；黄晖明 1976）。结构的变动并不必然造成首属关系的转变，虽然有些社会支持可以由社会组织机构提供，但亲属仍然是重要的支持来源之一，新兴的科技可以帮助维系跨越空间距离的亲属联系（Litwak and Szelenyi 1969）。

社会流动和社区居住时间的缩短，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社会交往的孤立，很多研究者发现城市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人际交往和首属关系纽带（Gans 1962a；Lewis 1952）。Wellman and Leighton（1979）在文章中提出个人社区网络取代以往的局限于邻里范围的社区概念。现代社会中虽然较少存在密实联系（close knit）的村落社区，但个人社区网络的确为人们应对压力和机会提供了积极的安排（Wellman, Carrington and Hall 1988；Wellman 1990, 1992b；Campbell 1990）。

人们从公共领域的退出，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冷淡，除了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是同整个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息息相关的。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了近几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益个体化的趋势（Putnam 2000）。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再是“组织人”的形象，工作和职业也不再占据他们社会交往的中心地位。不但如此，中产阶级同时也退出了以往他们热衷的各类正式组织、俱乐部、社区活动（Putnam 2000）。英国的阶级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白领和蓝领工人趋同，成为“后工业的无产阶级，没有稳定工作，没有明确的阶

级意识……（这个后工业无产阶级的）成员不再从工作中寻求解放。相反，他们希望从工作中求得解脱，在家中、家庭生活和休闲娱乐中创造一个私人的天堂，他们投身其中去获取个体的自主和个人的满足”（Marshall, Rose, Newby, and Vogler 1988: 2）。Marshall的分析指出后工业社会中日益私人化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散化（diffuseness）。这种影响人们生活状态的体系不仅仅限于生产领域，也包括逐渐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和消费领域。

可是，随着西方个体化思潮的传播，晚近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方向会是如何呢？是否也会亦步亦趋跟随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还是有其他的方向呢？特别是对华人社会中产阶级来说，传统的家庭伦理对中产阶级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中产阶级对政治态度冷淡，社会参与度低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将指向何处？

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新兴中产阶级被视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壮大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和中产阶级社区的社会交往自20世纪中叶开始成为家庭、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可能在这些研究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根据，即社会变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这些新兴的阶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体化趋势表现在了中产阶级身上。中产阶级是否退向更为个体化的生活。

在晚近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中，譬如东亚、南美、印度等区域及国家，中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化议程中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往往被视为社会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产阶级从下层的工人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独裁政府和大资本家之间发展起来，成为推动原有的集权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主要社会力量（相关回顾见 Hsiao 1993; Glassman 1995）。

然而，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力量，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政治立场上的摇摆性，往

往使那些对中产阶级政治抱有希望的人落空（吕大乐和王志铮 2003）。需要指出，香港过往三十年来中产阶级是政府政策的得益者，政治上的冷淡既有当时殖民地政治的特点也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吕大乐和王志铮 2003）。香港社会不存在韩国的中产阶级为对抗政府独裁统治而与下层民众结成的联盟。

相对于中产阶级的职业分层、阶级意识的议题，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日常交往等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财产所有关系、职业地位和教育技术水平是最主要的分析要素。这种以职业为中心的分析，着眼点在中产阶级的市场处境和工作处境。然而，不了解中产阶级在工作世界之外的个人家庭生活，就难以真正理解和认识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一个强调家庭伦理的文化传统下，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作不再被视为生活的核心或不再是令人产生归属感的场所，要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就必须考察中产阶级的个体、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个体价值观等方面。

其实循着这一分析思路，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和这一阶级的生活品位。这一方面的描述性研究，最初是从昂贵消费品的市场群体的建构中发展起来的。研究者（Pinches 1999；Davis 2000）开始从新富阶层的消费出发，来分析这一新的群体如何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但随着经济环境的转变，新中产阶级面临经济收入下降和更大的工作压力。已经有研究者指出中产阶级应对危机将产生的改变。中产阶级将如何应对经济转变的挑战，日益成为研究者关心的话题（吕大乐和王志铮 1999；并见吕大乐和王志铮 2003 文献综述）。

香港和北京处在不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北京的中产阶级仍处于逐渐生成的阶段，中等收入的职位在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逐步提高；香港的中产阶级已经经历了这一阶段，经济转型在创造新的职位的同时，也开始使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面对更大的压力。

本书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持。中产阶级是否退向更为个体化的生活，是否难以找到支持来源，支持来源是否更为局限？这两个华人都市社会的中产阶级，在需要支持时，是不是主要依靠他们的亲属，他们的支持网组成中亲属与非亲属、近亲属与远亲属、配偶与亲子，何者更为重要（相对的重要程度怎样）？中产阶级在选择支持来源时，理性的机会限制及交往成本的影响作用有多大？中产阶级是不是就一定享有很高的支持感受？在不同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状况的中产阶级个体之间，支持网络和支持感受是否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包括：中产阶级从哪一类人获得了哪一类支持？是否不同的关系角色提供的支持类型也不相同？家庭、朋友、同事等关系类型，对中产阶级的支持作用是否有大小轻重之分？中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整合和支持网络与他们获得支持的来源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中产阶级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与感受支持的关系如何？在中产阶级中间，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否存在支持上的分化？

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填补以往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研究的空白。一方面能够说明中产阶级的社会交往模式，特别是社会支持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理解中产阶级的态度和取向提供基础。中产阶级一般来说拥有较多的资源，能够而且也倾向依靠个人努力解决问题。那么是否中产阶级在生活中更为独立？他们在需要时的支持网络怎样？这些问题需要把中产阶级放入支持网络中去加以比较才能得到答案。除了对特定阶级生活的理解之外，分析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类型（性别、代际、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在职与否）之间的异同，可以分析个体要素对支持网络和支持感受的影响作用。通过比较香港和北京的中产阶级在上述各方面的异同，可以思考中产阶级身处的社会位置和宏观制度结构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比较分析中产阶级在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模式，其意义不仅在于此。“差序格局”是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香港这样一个成就

取向主导的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家庭关系面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多利益的考虑，表现为“工具性的个人首属网络”和“功利性的家庭主义”（Lee 1985；Lau 1982）。在直接进入市场竞争的华人社会中，“功利性的差序格局”（Lee 1992）成为人们依托传统适应现代社会压力的主要策略。个人在建构关系网络的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家庭/非家庭、亲属/非亲属的考虑之外，实用的、功利的计算也相当重要。在传统的家庭伦理和现代社会的功利化的双重变奏之下，传统的关系类型在延续的同时，又被加以利用和改造。然而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国，在现今转入市场竞争社会的过程中，人际关系网络一方面仍然沿袭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特征，另一方面又处于市场转型的推动作用之下。比较市场化的香港和市场改革中的北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共同的文化传统下人们怎样应对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变化。

三 全书结构

接下去的第二章将展开讨论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包含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是本次研究的基础：首先介绍的是，网络分析的发展及影响社会网络（个体网）的诸因素；其次总结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社会支持领域以来的社会支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成果；然后归纳社会宏观结构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主要针对华人社会面对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论述；最后分析现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交往研究的实证资料。

第三章介绍本书的分析架构和研究方法。在第二章理论讨论的基础上，第三章建构本书的理论分析架构，一一说明各主要分析变量，简要介绍将要使用的数据分析模型；同时介绍本书使用的调查数据来源、测量工具和研究设计；并着重说明本书的分析对象——中产阶级的操作化定义及其基本经济社会特征。

第四章采用支持网的测量工具和描述方法，分析两地中产阶级

在六项支持需求上支持来源的角色组成。要探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从哪一类人获得哪一类支持？

第五章比较两地中产阶级之间支持网的结构和组成方面的异同。在第三章方法部分，我们介绍了测量支持网结构和组成的三个变量：支持网功能数、关系多样性、支持网亲属组成（人数/比例）。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将依次比较两地中产阶级在三个变量上的异同。

第六章要揭示两地中产阶级支持感受的异同，探究两地之间相同或者相异的原因。在前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章考察几类主要的可能影响支持感受的解释变量，包括社会位置、社会整合、支持网结构组成，剖析这些解释变量对支持感受的作用机制。

文末的第七章在总结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回应篇首提出的问题，并说明本研究存在的局限。

第二章

网络分析、社会支持与 中产阶级研究

一 社会网络分析及影响社会网络的诸要素

(一) 网络分析从其出发点上就反对功能论的价值规范对个人行为的解释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网络分析者认为这两种取向大致上可以归为“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足”两种问题 (Grannovetter 1973; Galaskiewicz and Wasserman 1993)。前者过分强调个体对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化而忽视了包括个人主动选择在内的其他要素；后者则恰恰走向反面，认为个体是积极的、讲求策略的，却是社会化不足的行动者。从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结构功能论还是理性选择论都没能看到个体和他人的关系对个体的行为造成的限制和提供的机会 (Wellman 1988)。

其实早期的关系网络研究者 Mitchell 就系统地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位置层面的、类别层面的和关系层面的^① (1969: 9 ~

① Mitchell 提出的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原来的名称是：结构层面的、类别层面的和个体层面的 (1969: 9 ~ 10)。根据 Mitchell 对每一种的解释，为统一本书的名词概念，我在这里顺次转变为：位置层面的、类别层面的和关系层面的。

10)。位置层面(结构化的位置)的视角是指根据个体所处的位置,如家庭、工厂、工会等,说明个体的行为。类别层面是指非结构化的类别,譬如性别、种族、阶级等。而个人层面则是指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网络成员与其他人的关系。Mitchell 认为上述三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一种行为可以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的理解(意指分别代表不同的抽象层次)。但三者之中,在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时,仅仅看他们所处的位置或他们所在的类别并不足够,关系层面的视角才是至关重要的(Mitchell 1969: 10)。

所以对于网络分析家来说,从事各类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在各个尚未采用网络分析的研究中加入网络(关系)层面的概念和变量,比较传统分析中的解释要素与新加入的网络要素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从而证明网络分析的重要价值和广泛的适用范围。

同样在“网络”之外,关注网络研究发展的学者也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比较网络分析与其他理论取向之间的相异之处。网络分析被认为是结构分析的一种,与其他结构分析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Parsons 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关注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把它视为从属于制度化的价值与规范的子系统。Levi-Strauss 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也分析社会关系,但主旨是要发现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而关系网络研究是要在 Parsons 的宏观视角和 Coleman 与 Homans 的微观视角之间,建构中层的结构视角(Blau 1975b)。相似的划分也可以参考 Lopez 和 Scott (2000) 对几种社会结构的论述,作者们区分了“制度化”的结构、“隐身”的结构(embodied structure)与“关系”的结构之间的差异。他们持有一种综合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关系的和隐身的结构^①是三种相互依赖的社会结

① “隐身的结构”(embodied structure),源自理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制度化”的结构或“关系”的结构背后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个体行动的特性(behavior dispositions)。与语法结构作为语言和文本背后的根本结构相似,隐身的结构根植于人类身心的习性和技能,使得“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得以产生、再造和转变(Lopez and Scott 2000)。

构类型，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社会网络分析家未必同意这种综合。其实网络分析在发展中，为突显理论的解释力，一般来说会特别标立新的网络分析视角与既往结构化理论间的区别，甚至是对立。网络分析，简单来说，是分析社会关系的结构，研究这种关系的结构怎样影响稀缺资源的分配、限制行为，以及导致社会变迁。

社会网络对个人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分析是通过人们的社会网络理解他们的行为，网络研究的范畴（domain）是人际关系的特征（Fischer 1977：19-20）。社会网络的概念并不新奇，社会系带（bonds）等概念都是分析相类的对象。网络分析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使隐喻的概念更为明确、更有结构，研究方法上更为规范。网络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许多研究主题上获得广泛应用，特别对社会支持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将在本章稍后第二部分详加论述。

（二）网络分析解释力的竞争优势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逐渐成为社会学中一个主流研究领域，将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理论成为该领域自身的研究者所倡导并为众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接受的观点。而问题逐渐转变为，网络分析是不是比其他理论方法更有力地揭示了社会结构，更有助于分析和理解社会现象？下文以网络分析在求职研究、个人社区研究、政治共同体研究中的表现为例给出肯定的回答。

社会网络对求职的分析是展示网络分析解释力的典型例子。Grannovetter（1973）的分析开宗明义指出应当反省经济学的职位获得研究只关心个体的人力资本，他提出经济学分析劳动力市场时忽视了网络关系视角。Grannovetter 指出，有关工作的信息和机会是受制于社会网络特征的，某种类型的网络存在与否会影响个人的职业获得。在分析求职问题的基础上，作者提出更为一般的“嵌入”理论，说明经济行为嵌入了社会关系网络中，进一步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Grannovetter 1985）。

针对职位获得，在网络分析内部也同样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Grannovetter (1973) 的弱关系理论就面临 Burt 的结构洞理论的批评。Burt (1982) 指出网络位置方面的“结构洞”更为根本地反映了 Grannovetter 的弱关系纽带所具有的结构化特征。弱关系的力量来自弱关系的拥有者所占据的“结构洞”的有利位置。此位置周边的人需要通过该位置才能相互连接，所以居中的人以其优越的位置而获益。如果将 Grannovetter 的理论称为“关系说”，则 Burt 的理论则可以称为“位置说”，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 Lin (1982) 的“资源说”。Lin 认为弱关系力量的实质在于它能够接触更高位置的联系人，即接触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理论的背后假设是强关系连接的总是相似的个体、相类似的信息资源；而如果要接触比本人地位更高的联系人和更多的资源，就需要弱关系纽带。所以 Lin 认为关键不是关系纽带的强弱，而是通过关系纽带接触到的资源多少。

“关系说”、“位置说”、“资源说”三者各执一词，分别指出了关系网络不同方面的要素，各有其理论的解释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检讨了上述理论的适用范围，Bian 从关系所处的制度条件质疑弱关系纽带的作用，他提出一个人在职位资源有限且处于劳动力再分配体制的条件下，需要强关系纽带才能获得较好的工作职位 (Bian 1997; Bian and Ang 1997)。也有研究者提出弱关系作用理论有一定的适用对象，对那些本身地位较高的人来说，弱关系未必有作用，相反强关系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某类人当中是有效的关系，在另一类人当中未必有效力。上述两方面的检讨受到资源论的启发，说明仅分析关系强度的研究存在的局限。

在关系说、位置说和资源说之外，又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开拓出“网络多样” (variety) 的价值 (Erickson 1996)。Erickson 认为，多样化的网络成员可以带来多样化的文化资源，多样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有助于职位获得。Erickson 用“多样化”理论分析加拿大的资料，说明文化多样化与网络多样化相辅相成，文化高